

理性与自然：浅谈安提戈涅之冲突

桂子金

成都锦城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索福克勒斯是古希腊著名的悲剧作家，其名作《安提戈涅》讲述了俄狄浦斯的女儿安提戈涅为下葬兄长波吕尼刻斯而违反国王法令，最后导致一系列的悲剧的故事。剧中以安提戈涅和克瑞翁为代表体现了包括神学—政治、血缘—国家、个体—城邦等多对冲突。本文通过剧中人物象征意义及列奥·施特劳斯、黑格尔、海德格尔等思想家的相关论述，梳理几对剧中突显的冲突，从而分析《安提戈涅》中的“冲突”在政治层面的影响及其启发性。

关键词：安提戈涅；理性；自然法；冲突

1 引言

索福克勒斯被称为古希腊悲剧的三大作家之一，悲剧《安提戈涅》¹讲述了底比斯国王俄狄浦斯在知道了自己弑父娶母的真相之后，放弃王位，离开底比斯四处漂泊。俄狄浦斯的两个儿子纷纷背弃了他并且争夺王位，大儿子波吕尼刻斯被逐出底比斯之后娶了亚各斯国王的女儿，在朋友和盟国的帮助下，他开始兴兵报复，想夺回底比斯的王位。正如神谕预测那样——“离开父亲，他们谁都没法获得胜利、取得王位”，最后俄狄浦斯的两个儿子在底比斯城前的决斗中双双战死，最终他们的舅父克瑞翁成了底比斯的国王。克瑞翁上任后颁布了一条法令：波吕尼刻斯背叛了祖国，带领异乡人来攻打自己的祖国，对底比斯和底比斯人都犯下了天大的罪过，因此禁止下葬波吕尼刻斯，任何违反命令的人都将被视作叛国者的同谋，一律用乱石击死。善良的妹妹安提戈涅不忍心兄长的灵魂得不到安息便冒险埋葬了波吕尼刻斯。最终克瑞翁决定释放安提戈涅，但她先一步自杀了，克瑞翁的儿子海蒙——安提戈涅的未婚夫——和妻子欧律狄刻也相继自杀。

索福克勒斯透过安提戈涅的悲剧告诉我们，价值观和人生选择的冲突来自人性本身的矛盾，对错没有绝对标尺，横看成岭侧成峰，因此最艰难的选择不在于善恶之分，而是在看似都正确的选择中抉择一条唯一的路径。《安提戈涅》的核心就在于冲突的不可化解性。

《安提戈涅》是古代悲剧中的典范，在西方思想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许多著名思想家都从不同

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剖析，本文将从政治生活的角度分析其该文本揭露的政治生活的本性。

2 解析《安提戈涅》中的主要冲突

冲突的问题是政治生活中最古老的问题，了解冲突是什么、引起冲突的原因、如何控制和遏制冲突，才能进一步解决诸如法律与道德、个体与集体的平衡的问题。美国政治科学家詹姆士·麦迪逊曾认为：如果人的社会没有冲突，如果我们的自然处境不是充满了竞争、嫉妒、歧见，那么法律就不再是营造秩序的必须手段了。从这个角度再解读《安提戈涅》，可以分析出其中涵盖的几组不同层次的冲突。

2.1 神学与政治冲突：

神学与政治之间的冲突一直存在于政治生活中。20世纪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提出“神学—政治困境”，揭示了人的理性与对自然奥秘及宗教之间的张力，神学与政治的问题是一种自然与社会的问题，是人类不可逃避的宿命。神学和政治的结构包含两个基本对立：政治与哲学的对立、神学与哲学的对立。“神学—政治困境”应对的主要问题在于权威的终极来源是什么——权威究竟是源于城邦及其统治者，还是流传于上帝或者诸神及其委命的祭司或阐释者？代表底比斯及其法律权威的克瑞翁是国家的象征，对波吕尼刻斯视作叛国者的惩罚是对保护国家利益和尊严的维护，是国与法的理性行为；而安提戈涅，在世俗道德及宗教的层面，她一方面不希望兄长被弃尸荒野，另一方面也是遵循了暗示克瑞翁的做法将对国家带来灾难的神谕，所以她的行为也是合理的。但这两种行为却相互对

1 文中《安提戈涅》引文出自刘世洁等编著《古希腊神话故事》，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年。

立相互抗争，这就形成了政治生活中最原始的一种冲突。

在古代宗教和国家一体的时期，这个问题必然是政治生活的核心，“神学－政治困境”也体现在雅典与耶路撒冷之争中，从耶路撒冷的层面来说，敬畏神是人类从古至今最深的经验，而对于雅典，人类对知识和理性的渴望成了最高追求。从根本上说，这是自然与社会、哲学与信仰的冲突。

2.2 家庭与城邦冲突：

在众多对《安提戈涅》的解读中，有学者认为其体现了人在社会中的两种纽带的吸引力的冲突——家族血缘与国家认同。索福克勒斯引出的这一思考至今也没有解决，成为我们作为个体在国家、集体参与政治生活中的选择困境。有人主张国法重于人权，而等级是人的自然本性，人与自然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因此国家法律作为成文法对全体公民具有绝对的约束力，维护法律和国家机构的权威是正道。克瑞翁作为国家统治者对国家敌人波吕尼刻斯和违反王法的安提戈涅进行惩处是依法办事，是理性的化身。而安提戈涅无视国家制度违抗法令，理应受到惩处。

2.3 男性与女性冲突：

《安提戈涅》中另一对明显的冲突就是安提戈涅与克瑞翁之间的女权冲突，表现了女性反抗父权制压迫的斗争。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2中也曾指出，“安提戈涅与克瑞翁之间的男权与女权冲突体现了女权主义法理学与男性证实主义法理学之间的冲突”。在法律思维层面，女性更容易侧重于家庭伦理思维，比较感性，偏向于以道德、人情挑战、甚至制约法条法规；而男性更注重规则和理性，常陷于法条主义。在莎剧的《一报还一报》3中安哲鲁与伊莎贝拉之间的矛盾冲突也体现了这一观点。

2.4 道德冲突

黑格尔曾评价《安提戈涅》作为悲剧典范描述了两种最高的伦理力量的冲突。安提戈涅与克瑞翁分别选择了一种极致的伦理力量为行为引导，具有强烈的片面性。双方的选择都包含了片面的不正义，但双方同样也包含了正义4。因此，安提戈涅和克

瑞翁的立场代表是相互冲突的道德视角。

若克瑞翁只是一个暴君，那安提戈涅对他的挑战就显得无意义，他的失败也就失去了悲剧性；相反，正因为他作为政治体和公共身份有着正义的立场，他是公共秩序与法律规范的代言人，他的最高伦理义务就是城邦的福祉，城邦及其规范高于家庭和血缘这一自然纽带。在克瑞翁看来，人的理性不仅能为社会安全和福祉创造公共规范，它还是技术统治的源头。“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名言表达的就是这个观点：通过自觉运用理性的技艺与筹划而取得对自然的完全控制，保障我们自己的创造力、自治性和自主决定。

而这种启蒙人文主义的对立面就是代表家庭伦理的安提戈涅。她并不是单单代表一个被公共权威所威胁的个体道德准则，她代表的是家庭伦理义务；但她的道德又不仅与家庭的纽带相关，家庭与宗教之间的联系也是她的道德经验核心。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腊城邦并非世俗民主，而是一种宗教、法律和政府不可分离的共同体，在此“宗教无论对私人生活还是公共生活都产生了绝对至上的影响。”（库朗热：2005）对于安提戈涅，她的行动并非受命于某种理性的人定法，而是某种高级法的命令，那就是神和自然。她认为血缘和家族的事实是根本的，因为他们是自然赋予的，是人与生俱来的；而家庭是道德归属比城邦更古老：家庭的存在无需城邦，但城邦的存在必须有家庭——城邦是意志行动的发明物，而家庭凭借自然这一高级法而存在。

3 结语

《安提戈涅》不是简单的善恶对错的道德范畴的探讨，安提戈涅与克瑞翁的矛盾是两套各自有效却相互斗争的社会道德，对人的价值及行为都具有约束力。这部悲剧的伟大之处不在于对错之争，而在于两套道德正当要求之间的冲突设置，这两种不可调解的道德规范成就了伟大的悲剧。

这部剧虽然看似是关于两个完全对立僵持的立场的难题，但最终索福克勒斯通过克瑞翁的悔悟告诉我们：“一个人最好是一生遵守古老传统的律法”，这就表明虽然悲剧已经酿成，但他也接受了安提戈

2 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和《法哲学原理》

3 Shakespeare, *Measure for Measure*

4 黑格尔，《宗教哲学讲演录》，魏庆征译，548页，引文有改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涅的立场。一端是“人是万物的尺度”的纯粹理性政治，另一端是对自然和伦理敬畏和虔敬的态度。一种只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政治——漠视男女的自然差异、家庭与城邦的差异、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差异，另一种是与城邦、政治生活对立的自然人性。因此，理性与自然的冲突有时虽然无法调解，但如何寻找及建立二者之间的平衡点却是政治生活必须考虑的。

参考文献：

[1] 陈丽娟. 法理与人性的冲突——对《安提戈涅》的重新解读[J], 安徽文学, 2011年, 第8期: 第18-19页.

[2] 韩丽华. 在神律和人法之间——对悲剧《安提戈涅》的解析[J], 社科纵横, 2007年12月, 总第22卷第12期: 第297-299页.

[3] 库朗热. 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治研究[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

[4] 刘世洁等主编. 古希腊神话故事[M],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4年.

[5] 史蒂芬·斯密史. 政治哲学[M],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5年.

[6] 孙磊. 城邦中的自然与礼法[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4月, 第22卷第2期: 第80-86页.

[7] 苏力. 自然法、家庭伦理和女权主义? ——《安提戈涅》重新解读及其方法论意义[J], 法治与社会发展(双月刊), 2005年, 第6期(总第66期): 第3-23页.

[8] 肖琼. 谁是悲剧英雄? ——《安提戈涅》的三种经典解读[J],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第291-301页.

[9] 肖四新. 理性主义绝对化的悲剧——论《安提戈涅》的悲剧实质[J], 中央戏剧学院学报《戏剧》, 2003年, 第2期总第108期: 65-71页.

[10] 赵林. 黑格尔的宗教哲学[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年.

作者简介: 桂子金(1992-), 女, 回族, 云南省红河州, 讲师,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外国语言文学、大学英语教学。